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3 年第 2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3 年 3 月 26 日

编者按

1. 中国城乡分割与融合的人力资本效应研究.....皮建才 周愚
2. 政府规制、内部人控制与煤炭资源整合产权配置契约.....孙自愿 胡中原 王诗月
3. 中国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存在吗?谭娜 周先波
4. 中国农村医生离职倾向研究.....董香书 Proochista Ariana 肖翔
5. 中国农村居民的就诊选择研究.....孙梦洁 韩华为
6. 政府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财政责任.....张华初 吴钟健
7. 收入差距推迟婚姻吗?江涛
8. 土地财政依赖、财政缺口与房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郭珂
9. 创业视角下生产性公共支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渠道.....蒋含明 王军辉 李非
10.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一种解决机制——企业参股银行.....郭牧炫 廖慧
11. 金融控制、区域物价波动与金融发展.....李雪 星焱
12.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袁仕陈 何国华
13. 中美股市与汇市的关系.....陈云
14. 结识新朋友, 勿忘老朋友——贸易联系持续期与贸易多元化战略.....冯伟 邵军 徐康宁
15. 矿产资源地税收偏离与贫困.....宋文飞 李国平 韩先锋 孙永平
16. 应审慎地考虑新的人口政策.....王向 聂鹏
17. 经济系统研究新方法: 基于 Agent 的计算经济学.....范如国 叶菁 杜靖文
18. 开放经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述评.....李力 杨柳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中国城乡分割与融合的人力资本效应研究

皮建才 周愚 (南京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2 期

如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直是党和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我们打算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分割和融合进行分析,把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相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作为外生变量,考察这一外生变量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工资水平、收入差距以及社会和谐程度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随着城乡相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提高,第一,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数量会增加,城市最终产品部门就业量会增加。第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会上升,城市劳动力的单位有效工资水平会下降但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会上升,经济中的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会扩大。第三,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会提高,但社会内部不和谐程度也会提高。在引入垄断竞争的中间产品部门后,研究又发现:第一,城乡相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提高会增加中间投入品部门的产品数目,而且会增加中间投入品生产对最终产品生产产生的外溢效应。第二,在中间投入品部门产业集聚的外溢效应充分大的情形下,城乡相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提高会增加城市劳动力单位有效工资水平,并且会加速扩大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收入不平等。第三,在中间投入品部门产业集聚的外溢效应充分大的情形下,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加速,但社会内部不和谐程度的提高也会加剧。

城乡相对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城乡相对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的绝对提高)会促进城市产业的发展,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增加,也会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上升,但是城市劳动力会更加充分地享受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带来的收益,城市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幅度更大,从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相对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对降低)会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分化加深,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基于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会被制度约束放大,进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总之,城乡相对人力资本差距的扩大会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产生双重效应,每一种效应产生的后果都是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双重叠加以后会使结果更加恶化。在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分割和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城乡相对人力资本差距产生的影响。

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必须从缩小城乡相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角度入手。对缩小城乡相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而不是静态的角度来看问题,人力资本形成的滞后性特点决定了提高农村劳动力子女教育水平对将来促进

城乡经济社会融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从制度的角度看待问题，进行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为已经形成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创造出一定的条件，为尚未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最终形成提供一定的渠道。农村转移劳动力子女的教育往往会因为制度问题而难以跟城市市民的子女处在同一水平线，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往往跟户籍挂钩，但农村转移劳动力子女并不具有当地城市户籍。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子女在人力资本形成上跟城市劳动力子女相比处于劣势，城乡相对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不是被缩小而是被制度性地放大。

2. 政府规制、内部人控制与煤炭资源整合产权配置契约

孙自愿（中国矿业大学）、胡中原 王诗月（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经济转轨时期的产权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我国煤炭行业自2003年以来，整合风暴不断，国有企业迅速壮大，整体出现“国进民退”的局面。煤炭行业一直存在的政府和企业内部管理层双重控制煤炭资源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源整合的效果。因此在整合过程中如何合理安排所有制产权边界，防范管理层利用内部控制权谋取私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提升资源整合质量，成为我国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煤炭资源整合成败的关键。

研究政府规制、内部人控制与煤炭资源整合产权配置契约的目的在于从根源上挖掘政府与煤炭企业管理层掌握关键资源，对煤炭资源并购整合的政治经济影响，探讨煤炭资源整合中政府的“宏观经济规制权”和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权”两大权力因素如何影响企业产权归属。合理规划并全盘考虑和安排国有经济的“进”与“退”，做到“进”而有所为，“退”而有序，提升我国煤炭资源整合效率。

我们借鉴施密特（1996）、施莱弗和维什尼（1994）的研究思路，以所有权-控制权模型和控制权理论为基础，构建我国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基于政府规制和内部人控制双重视角的产权配置模型。政府规制是决定产权配置契约的关键因素，政府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非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决定煤炭行业产权边界的设置。我们将内部人控制权通过专有性投资系数内化到政府效用函数模型中，分析内部人通过影响政府效用，进而影响产权边界的设置。当政府和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人专有性关系越强，内部控制人越倾向于积极扩张国有企业规模，其对政府的“绑架效应”越强，这降低了政府控制资源的政治效益和增加了委托-代理成本。这种基于双重视角的产权契约模型与我国煤炭行业政府管控严格、国有企业林立的现状十分契合，这为模型在煤炭资源整合领域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分析得知国有企业能够产生政治效益和代理成本，私有企业虽然不能给政府带来政治效益，但是其不产生代理成本，也不存在专有性投资关系带来的资源价值流失。因此，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产权边界的设置对资源使用效益、政治效益、代理成本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都有重要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专有性投资关系不仅仅影响内部控制人效用,而且影响政府效用,是内部控制人影响政府行为的主要手段,政府需要培育经理人市场,弱化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人的专有性投资关系,提高国有企业管理水平。同时政府宏观经济规制要以必要程度为限,不能过度干预和控制,政府宏观经济规制不仅仅要限制其程度,给市场留下足够空间,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不能风暴常起。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该以经济效益的提升为目标,减少对资源政治效益的追求,不能以打造龙头企业进行资源整合为名,创造政绩工程为实,在行政区域内大搞“拉郎配”式的整合工程。

中国经济研究

3.中国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存在吗?

谭娜 周先波(中山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近年来,提高退休年龄的提议受到街头巷尾的热议,然而受到退休年龄影响的群体主要是城市老年人,相比之下,农村老年人的退休问题似乎已经被悄悄遗忘,人们在潜意识中认为,农村老年人是不存在“退休”问题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老年人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无休止劳动”的现象。

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会降低劳动供给时间。其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年龄的增加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的降低,从而引起劳动供给时间的下降,因此,健康因素可以解释年龄对老年人劳动影响的主要部分。但是,我们运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由于年龄增加引起的劳动下降程度中,在20世纪90年代,健康仅解释了其中的25%;在新世纪的前10年,健康解释的比重显著上升,达到了79%。因此,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现象有所缓解。

在研究过程中,的确也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即过多的劳动也损害了老年人的健康,使得老年人可能陷入到“越劳动身体状况越差,此时为了维持生存又需要更多的劳动”的恶性循环中。我们采用特定的手段来控制劳动与健康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研究的可信程度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初步的结论是基于客观的健康指标得出的,即是否过胖或者过瘦。如果将健康的衡量指标变为自评健康,即老年人对自我健康状况的分级评价(非常好、好、一般、差),结果则变得不容乐观。健康因素仅仅解释了年龄对劳动影响的不到2%,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即使自我感觉健康状况不佳,也不会大幅度降低劳动供给时间。

以上结果向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画面,虽然年龄的增加使农村老年人降低劳动供给,但其中来自老年人自身的主观健康评价所能够解释的比重少之又少,只有客观的健康指标才能形成一定的解释能力。换言之,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受并不能对劳动供给时间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当客观健康状况恶化到一定程度,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才会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即使进入新世纪,中国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状况还是广泛存在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青年人外出务工，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导致我国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现象受到冲击，使得农村老年人不得不选择延长劳动力供给。其次，因为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得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减少，家庭趋向小型化和核心化，意味着家庭收入减少，赡养老人的能力降低，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同时老年人高龄化也不断加剧，对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最后，也是最为主要的，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严重缺失，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缺乏老年生活的基本保障，只能依靠自己继续劳动，这使得老年人不得不选择不顾健康状况的下降而持续增加劳动时间。

农村老年人存在“无休止劳动”，不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话题，也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安度晚年，国家才能和谐发展、生机勃勃。然而，与这些美好的梦想相比，现实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制的建设，刻不容缓。

4. 中国农村医生离职倾向研究

董香书（北京大学）、Proochista Ariana（牛津大学）、肖翔（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农村医改在强调“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新医改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医疗服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否调动医生积极性成为医改成败的关键。我们运用“中国农村卫生人力资源研究：现状评估及未来需要的预测”项目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医生的离职倾向进行研究，结合实证结果和文献，归纳了影响中国当前农村医生离职倾向的机制：医患关系和农村医生离职倾向之间存在恶性循环；而工作收入与医院管理则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从中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正确处理医患关系是降低医生离职倾向的重要手段。由于医生在专业信息方面处于强势地位，患者的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局限可能使医生利用信息不对称，提供过度医疗。农村居民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在与医生的博弈中处于更弱势的地位。当出现医疗纠纷时，目前主要采取三种渠道：医患协商、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法律诉讼。但鉴定机构与医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诉讼一方面难以改变患者信息方面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其耗费的人力、财力与时间也是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难以承受的。单纯加强对农村医生的保护，一方面难以缓解医患的矛盾；另一方面考虑到农村医疗机构的分散性，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也难以实行。要破解离职倾向和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我们认为一方面应当参照国外同行评估（External Peer Review）的成熟经验，建立相对独立的医生行业组织，对于医患纠纷进行公正和中立的评判与仲裁。另一方面，需要尝试建立合理的医疗责任保险赔偿机制，借鉴美国的无过错医疗责任改革，尝试各种赔偿模式，以此来缓解医疗事故出现后医生与患者的矛盾。

第二，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工作收入偏低是农村医生离职倾向严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农村医生离职倾向和医患关系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对于农村地区，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应该更加大政府对于卫生的投入。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基

层卫生的财政投入,而且投入的方向在“补物”的同时注重对医疗人员劳务补偿(即“补人”)。当前政府对农村医疗机构投入集中于物质资本(病房、设备等)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服务质量,但在尚缺乏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可能给管理层带来较大的寻租空间;而农村医生的工作收入却并未显著提高。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农村医生的收入可以有效缓解当前存在的农村医生离职倾向。如果政府对农村卫生财政投入的过程中,在加大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医疗人员的工作待遇,将会有效降低医疗服务人员的离职倾向,从而提高农村医疗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当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更加体现基层医生人力资本在医疗服务中的地位。

第三,在提高管理上,政府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政府应当去医疗体制的行政化,给基层医院、医生更多的发展空间。当前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医院院长的机制,让医院主要负责人更注意向上负责,而对医院医生利益相对忽视。医院不是行政机构,存在较强的专业性,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医生在主要领导选拔与管理上的话语权。只有选拔懂业务、懂管理、有经验的人来当基层医疗的负责人,才能够真正改善管理,降低农村医生的离职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注重加大农村医生的培训力度,加大城市医院对农村医生的支持与培养,让农村医务人员不断更新医学知识;在职称评定等方面还应当向基层医生倾斜,以扩大农村医生的提升空间。

降低医生的离职倾向,提高医生工作积极性,关系到医疗改革的成败。如何采取具体措施稳定农村卫生人力队伍,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中国农村居民的就诊选择研究

孙梦洁(北京大学)、韩华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健康是人类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经济活动开展的基础。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增进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农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也决定了农民健康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以及医疗费用中自付比例的提高,农村患者尤其是农村贫困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现得非常突出。根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显示,2008年农村居民两周患病未就诊率和应住院未住院的比例分别达到37.8%和24.7%。在最为贫困的四类农村地区,农村居民两周患病未就诊的比例更是高达40.8%。由于不能获得及时的医疗服务,疾病已经成为导致许多农村居民陷入持续性贫困的重要根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此,对农村居民医疗需求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医疗体制,推动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为下一阶段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核心。能够便利而且及时地获得医疗服务与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存在密切的联系。尽管目前关于医疗服务和健康结果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尚未取得明确一

致的结论,但是,国内外众多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医疗保险等对患病率和死亡率等健康指标有显著影响。当前,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正经历着新的变革,通过研究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行为,分析并识别出阻碍医疗需要转化为医疗需求的因素,是保证政府有效干预农村卫生体系,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基础。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个体医疗需求行为的研究大多遵循一条基本的研究范式,即从个体效用理论出发,通过建立个体医疗需求模型,利用参数估计的方法获得经验证据。延续这一传统思路,我们利用2010年的农户调查数据来探讨中国农村居民医疗需求规律的最新发展。此外,基于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识别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贫困群体就诊行为的主要因素,着重考察贫困群体的门诊选择的影响因素与非贫困群体有何不同。

基于甘肃、河南、广东三省18个县的实地调查数据,我们分别采用三种离散选择模型对中国农村患者初次就诊选择与就医机构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支付水平仍然是制约农村患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正规医疗服务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于贫困患者而言,收入水平、疾病严重程度及自评健康水平对其就医选择的影响与非贫困农户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减少农村患者就医障碍的根本方法。可以预见国家近期开展的“大病补贴”等一系列减轻居民医疗负担的措施将有利于降低农村患者因病致贫的风险。但是,由于低收入农户的医疗消费能力较低,仅仅对大病补偿也可能将贫困农户排斥在外。政府若旨在提高贫困患者的就诊率则还需要针对低收入群体设计合理的新农合报销比例,适度提高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标准和补偿标准,以更有效地促进农村贫困患者的医疗需要转化为医疗需求。除此之外,我国农村居民就诊选择的影响因素在地区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地区卫生政策差异方面的思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西部地区,卫生政策的规划需要从需方着手,考虑如何加强农户的健康意识、提高医疗可及性,以期提高落后地区居民的就诊率。而在东部地区,政府则应从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着手,提升二、三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和服务效率,以期保证农户得到及时保质的医疗服务。针对慢性病频发的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则应基于流行病学调查来观察和预测农户的疾病发病状况,这有助于政府部门根据医疗需要提前对卫生资源进行更为合理的规划;通过加强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项目,既可以提高这部分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也可以缓解医疗需求上升对卫生系统造成的压力。

6.政府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财政责任

张华初 吴钟健(华南师范大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财政投入分析》,《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我国在向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大量中青年去城镇务工,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下,家庭保障功能弱化,传统的土地也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如果仍然完全依靠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的方式,农村居民必然不能达到老有所养

的目的。

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这种差异在社会保障领域尤为显著。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存在,农民始终游离在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的养老问题不断拷问着社会平等、城乡公平。2009年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选择10%的县(市、区、旗)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首次建立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多方筹资机制,明确了政府对农民养老的财政责任。然而在新农保实施过程中,却暴露出总体保障水平过低、政府激励制度不足、中青年农民参保意愿不高等诸多问题。在人口老龄化以及土地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之下,农民的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平等和城乡公平,我们以此为社会背景,测算出了不同缴费档次的养老金替代率以及补贴政策下的财政投入水平。

测算结论表明,当前新农保制度下,养老金替代率总体偏低。假设在基础养老金及政府补贴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基础养老金替代率仅为11.15%。即使按照最长年限、最高缴费档次参保,新农保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参保人退休后第一年领取的养老金收入与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仅为20%左右,这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55%的最低规定,与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总体而言,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新农保的比例相对较低,没有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依旧难以得到保障。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准公共产品,应与经济发展保持一致,与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为了让农民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同时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问题,必须加大政府对新农保的财政投入,用更多的财政补贴吸引农民参保缴费,最终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制度。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加以改进:

现有新农保政策下,基础养老金定额为55元/月。考虑到物价等因素,基础养老金的保障作用将逐年下降。为实现城乡之间的平等,政府应借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做法,以农民上一年度的人均纯收入为基数,按适中的比例确定基础养老金,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建议将基础养老金替代率调整为15%,在2020年之前逐渐提高到20%。

个人缴费补贴方面,现有制度只规定了最低的补贴标准,参保人往往不愿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建议按比例原则确定补贴标准,鼓励农民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尽早参保,按照个人账户缴费档次的30%对现有的补贴标准予以调整,有利于达到兼顾公平与激励的目的。测算结果还表明,上述调整在中央财政承受范围之内。

7.收入差距推迟婚姻吗?

江涛(西北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婚姻推迟现象日益显著。男女初婚年龄分别从1990年的23.57岁和22.02岁上升到2010年的25.86岁和23.89岁;从未婚人口看,男女25~29岁未婚人口

比例分别从 1990 年的 0.194 和 0.066, 上升到 0.363 和 0.216。这大体意味着在一个包括 25~29 岁男女各 100 人的社区中, 此年龄组男女未婚人口数在 1990 年分别为 19 人和 7 人。然而, 在 2010 年, 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了 36 人和 21 人。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经历着婚姻推迟, 他(她)们“被”剩下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以致于一系列与“剩”字有关的“有趣”词汇, 不断涌入社会生活, 如“必剩客”、“斗战剩佛”和“齐天大剩”等。

婚姻推迟对社会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 社会对婚姻推迟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般看法认为, 婚前同居、单身文化和“男高女低”的匹配观念等, 导致了婚姻推迟。然而, 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是不变的, 它们难以解释男女未婚人口比例逐年攀升的现象。沈新风解释了当今社会出现的“甲女丙男”现象。然而, 婚姻推迟不只属于依教育或收入高低而划分的群体, 它表现为整体性的婚姻推迟。

国外分析婚龄变动问题, 更多地与男性收入相联系。这里最为著名的是贝克尔的研究, 他认为婚姻的家庭内分工的功能, 使高工资男性可以更多地从事市场劳动, 从而获取更高的收入回报。为获取更高的收入, 高收入男性将提前进入婚姻。因而, 男性收入越高, 结婚越早。然而, 这与我国城市“剩男”的大龄未婚现象不一致。他们收入较高, 但仍然被“剩”下了。伯格斯特龙和巴格诺利提出了相反的看法——男性收入越高、结婚越晚。由于收入的高低意味着男性在婚姻市场地位的高低, 因而, 高收入男性为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位置将推迟婚姻, 直到他们经济上成功的信息向潜在婚姻对象显示; 而收入较低的男性为了避免未来收入较低而在婚姻市场处于不利位置, 从而提前结婚。故收入越低, 结婚越早。然而, 它与农村“剩”男的基本特征——“收入较低, 婚姻推迟甚至不婚”不一致。

借助将单身男女类比为劳动市场中的工作搜寻者和闲置岗位的思路, 笔者得出了这一结论——女性婚姻推迟, 是由于个体间差距上升带来的。男男或女女质量差距的上升, 导致了各自平均质量的“被”上升, 由此带来了男女各自适婚群体规模大小的变化——男性平均质量的上升, 降低了男性在经济上适合结婚人群的比例; 而女性平均质量的上升, 提高了女性在经济上适合结婚人群的比例。因而, 婚姻市场将出现数量上升的适婚女性“竞争”数量下降的适婚男性的现象, 从而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女性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 但分别降低和提高了男性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因为更多的女性搜寻更少的男性)。最终, 延缓女性进入婚姻和加速男性进入婚姻, 即导致女性未婚人口比例上升但男性未婚人口比例下降。基于普遍观察到农村女性嫁入城市但很少观察到城市女性嫁入农村的现象, 用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代表男性之间的平均差距。通过相关分析, 笔者发现女性未婚人口比例随着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或工资差距扩大而上升, 但男性未婚人口比例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或工资差距扩大而下降。这表明, 收入差距推迟了女性婚姻, 但提前了男性婚姻。

从实际情况看, 我国婚姻推迟表现为男女未婚人口比例的同时上升。收入差距解释了女性婚姻推迟, 但难以解释男性婚姻推迟。男性婚姻推迟在于出生性别比的上升, 导致了男性的搜寻成本上升而搜寻收益下降, 最终促使男性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而女性未婚人口比例下降。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男女婚姻推迟是由于不同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推迟了女性婚姻,而出生性别比上升,推迟了男性婚姻。

8.土地财政依赖、财政缺口与房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郭珂(厦门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房价的过快上涨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政府在房价上涨中的作用也始终为社会与学术界所关注。虽然中央政府频频出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相关政策,但是我国地方政府固有的财政体系造成了政策无法落到实处。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存在“土地财政”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土地财政是指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比例较高。我国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会直接导致地方政府有推高地价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的动机,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机会也会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地价的升高必然引起商品房销售价格的上升。因此,研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有助于解释我国现存的高房价现象。

对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房价的影响,经济学和财政学理论界已经做了比较成熟的研究,大部分文献都认为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房价的变动呈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现有文献对土地财政现象的解释所考虑的因素过少。事实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所涉及的寻租活动,一方面满足其自身的运行需要,另一方面也促进当地的GDP增长,其影响因素是复杂的,仅从政府角度出发或仅从市场角度出发研究土地财政都是不完善的。为了能够更为完善地解释土地财政与房价大幅上涨的内在联系,除了地方政府本身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外,还应从人口基数、经济总量、商品房供给量和房地产市场资金供给四个方面进行考量,同时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层面对土地财政依赖与房价的关系进行解释。

研究表明,我国土地财政依赖、财政缺口、房地产国内贷款与房屋价格之间存在相互反馈的作用机制。对我国1999-2009年省际房价多元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土地财政依赖具有显著为正的滞后效应,对房价存在显著的提高作用。此外,地方财政收入缺口和房地产国内贷款对房价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土地财政所伴随的土地市场的公开出让等行为能够显著改变土地的市场价格,通过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影响商品房的销售价格。

因此,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模式对于近年来房价的不断提高起到关键的作用,应当充分认识到其重要影响,在经济和政策上引导地方政府改变以土地出让获取财政收入的融资方式:首先,继续深化房产税改革,改变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我国税收体制改革应进一步深化,着力培养地方税源,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其中,已在试点城市进行的房产税改革应继续施行,条件成熟后应逐步向全国推广,将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财政转变为以房产税等地方税种为主的长效财政体制,降低地方财政的土地依赖。其次,加大财政体制改革,减小地方财政收入缺口。地方财政收入缺口的降低依赖于财政体系的完备,包括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分配方式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否合理有效。建立起完备的财政体系后,地方财政收入

缺口会随之减少,从而降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取财政收入的动机。最后,完善土地管理相关制度,加强土地市场的监管。尽管我国现有诸多法律法规对土地的取得、用途等方面做了规定,但部分条款流于宽泛,或因执行不力而导致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因此,应加强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细化相关概念与管理条例,积极贯彻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建立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使用地朝着节约和集约的方向迈进。

9. 创业视角下生产性公共支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渠道

《企业家创业、生产性公共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方法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的创业热情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大量的创业型企业应运而生。张维迎和盛斌 2005 年在《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中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他们指出,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代表的企业家创业在繁荣我国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催生产业中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当前,国内外大量的专家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企业家创业通过新知识与新思想的外溢来促进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现有文献都普遍忽略了生产性公共支出在这种影响机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显示由于知识流动和信息扩散渠道的不同,其成本随着距离增加而增加。而一些高技术产业知识溢出的地方性特征显著,相较于传统部门涉及更多的隐形知识,这种隐形知识高度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讯、网络设施的不断完备为研发者和创业者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新知识、新发明和新观念的推广和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城际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建设等财政支出所带来的高效快捷的交通缩短了企业家之间的地理距离,拓宽了新知识与新思想外溢的范围并且降低了企业家面对面相互沟通的成本。另外,政府科学经费资助的科研机构一方面举办各类讲座、论坛、沙龙等活动为企业家之间相互交流与学习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与实际生产紧密接触并输送创业型人才衍生出了大量的“知识创业”正逐步成为知识外溢的重要载体。除此以外,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知识积累的外溢需要通过人力资本进行创造与传播,这种溢出效应涉及“聪明人与聪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能够提升企业家们的人力资本,同样提高了新知识与新思想外溢与传播的效率。

上述研究背景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全新的问题。总体而言,企业家创业通过知识外溢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在这一增长机制中生产性公共支出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关键性的作用。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论是肯定的,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经济的快速成长涌现出了大量的市场机会,这些市场机会为新企业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经济的成长就是以大量富有活力的新企业的产生和成长为标志的。中国以个体和民营经济为代表的企业家创业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结论说明能否制定出有利于发挥企业家创业的制度和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至关

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财政政策需要关注一个较为重要的新视角。继续加强我国落后地区的通信、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为落后地区企业家之间以及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企业家的交流与合作创造更加便捷的条件;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引导和集中各类教育投资,合理发挥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合理运用政府科学经费举办各类讲座、论坛、沙龙等活动为企业家之间相互学习提供有效平台,都将成为推动企业家知识溢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10.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一种解决机制——企业参股银行

郭牧炫 廖慧 (南开大学)

《民营企业参股银行的动机与效果研究——以上市民营企业为例》,《经济评论》2013 年第 2 期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在整体规模增大的同时,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也在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规模。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却十分有限,在全国工商联近年来组织的民营企业调查中发现,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对外部资金的旺盛需求、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和实际融资中的困难。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金融体制安排造成的,中国的金融体制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发展缓慢,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对信贷资源有很强的控制力。国有企业受中央或地方政府控制,一方面其利润的大部分归政府财政收入,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存在天然的联系,不易受到融资约束,中国的国有企业无论绩效如何,都可以轻易获得银行融资。相比之下,民营企业与政府或银行均没有天然的联系,极易受到银行信贷歧视。

从工业化进程的角度看,上述制度安排也是合理和必要的,因为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民营企业得以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快速赶超战略。但弊端就是抑制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的银行偏好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贷歧视。

因此,民营企业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找克服银行信贷歧视,增强其获得信贷能力的方法。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显示,企业参股银行业可以帮助银行获得更多企业的信息,减少企业与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有助企业获得银行的贷款、降低贷款成本。

另一角度看,我国的银行业属垄断行业,垄断优势为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垄断利润,民营企业参股银行也可能是出于分享银行业垄断利润、丰富收入来源、减少收益波动的考虑。从上市公司各年利润来看,银行业的利润远高于非金融企业。

那么,民营企业参股银行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机制,帮助解决因产权差异而带来的融资难问题,还是这种参股行为仅仅是为了分享银行业的垄断利润。

为了解答上述疑问,我们研究了上市民营企业参股银行的行为,拿参股银行的民营企业和没有参股银行的民营企业做对比,发现参股银行的民营企业整体负债水平明显高于后者。银行借款方面,参股银行的民营企业在短期银行借款上显著的高于后者;不过在长期银行借款上,两类民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企业收益方面,参股银行的民营企业收益水平低于后者。此外,我们还专门比较了民营企业在参股银行前后融资和财务方面的差异,发现参股的民营企业在整体负债水平、银行借款方面都有明显的增加,增加的主要是短期借款。参股后民营企业的绩效水平出现了显著下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民营企业参股银行的目的主要在于克服银行信贷歧视,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虽然参股银行增加了非主营收益在利润构成中的比重,但整体收益却出现了下滑。

去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投资参股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我们认为政策的支持将促使更多的民营企业投资参股商业银行,这种模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11.金融控制、区域物价波动与金融发展

李雪 星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物价波动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近年来,主流观点认为物价不稳定显著不利于金融系统的运行,通货膨胀会对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和控制程度不同,那么物价波动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存在差异。基于这点考虑,我们对中国各省份的金融控制程度进行了划分,并且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在金融控制弱的地区,物价波动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很强;反之,在金融控制强的地区,二者的关系很弱。因此,要通过平抑物价来促进金融发展,必须首先降低金融控制程度。

从金融控制的研究框架着手,尝试寻找中国金融发展与物价波动之间关系的合理解释,是我们的一个创新。中国目前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重要时期,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交杂并存,金融市场更为突出,各地区间的资金流动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而且中国本身地域辽阔、地区间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以上这些特殊的经济背景驱使我们为研究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框架,即对中国各省份的金融控制程度进行了细致划分。在划分方法选取上,首先摒弃了依据各区域储蓄与投资间的相关关系这种传统的划分方法。因为对于储蓄远大于投资的国家(如中国),在经济周期作用下会出现储蓄与投资同期不匹配的问题,致使划分出现偏差。其次,我们也并没有直接使用国有银行存贷款之间的相关性指标。虽然这种划分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周期性划分的偏差问题,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做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金融改革,除了少数几家大型国家背景的金融机构外,大量的非国家金融机构正逐渐壮大,在企业外部融资中的表现值得肯定。此外,非国有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和地方特

色, 在研究各区域金融控制程度时, 势必要将非国有金融机构的贷款状况考虑在内。所以, 我们最终采用估计各地区金融机构(国有与非国有)各项存款额与贷款额之间相关系数(ρ)的方法, 按照 ρ 值高低排序, 具体将 31 个省份划分为金融控制弱 ($\rho_{\text{简单平均}}=0.4589$)、中强 ($\rho_{\text{简单平均}}=0.6741$)、强 ($\rho_{\text{简单平均}}=0.8261$) 三个区域。

在指标的选取中, 我们将反映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设定为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各地区 GDP; 采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 模型)以物价水平的条件标准差来衡量物价整体的波动性; 设定物价波动与实物投资的交叉项, 来观察物价波动是如何通过实体投资间接作用于金融发展的;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同时, 又选取了四个主要的控制变量。然后, 我们对以金融发展为被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 分区域对以上主要变量作了面板单位根检验, 结果各变量都为二阶单整 $I(2)$ 。接着, 利用豪斯曼检验证实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正确后, 分别对金融控制弱、中强、强三个区域进行协整分析, 发现变量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由于金融控制程度的不同, 每个区域又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让我们得到了一系列新的结论: 第一, 在金融控制弱区域, 物价波动对金融发展有显著的负面效应, 且物价波动可以通过实体投资加强对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第二, 在金融控制中强区域, 物价波动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仍然为负相关, 但物价波动通过实体投资来影响金融发展的间接效应有所降低。第三, 在金融控制强区域, 物价波动对金融发展的直接负效应进一步降低, 二者更接近于一种“中性”关系; 同时, 间接负效应也随着金融控制的加强而逐渐减小(相对于前两个区域降低了 3~5 倍)。可见, 金融控制程度的提高改变了物价冲击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现实经济中, 原本可通过降低物价波动促进区域金融发展, 却因金融控制的存在而变得难以操作。因此, 我们建议若要有效地通过平抑物价波动来促进金融发展, 首先要降低金融控制程度。

12.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

袁仕陈(江苏大学)、何国华(武汉大学),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2 期

自 1994 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 中国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特别是 2003 年之后, 国际收支顺差更是大幅增长, 这意味着中国存在着大幅的国际资本流入。尽管此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人民币缓慢升值、改革结售汇制度, 实施“藏富于民”政策以及“走出去”战略等众多的措施, 但情况依旧未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国际收支的大幅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严重过剩, 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过度、快速地升值, 我国央行被迫经常购买外汇, 致使我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不断增大。为了尽量消除国际资本大幅流入对我国国内经济的不良影响, 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和独立性, 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我国央行通过回收再贷款、调整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调整等众多手段对国际资本流入进行了大幅的冲销。然而, 遗憾的是, 我国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压力还是同国际收支一样呈现出长

期、持续、快速的增加。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及货币供给三者同向、快速的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进而使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和国内货币供给的自主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

那么,中国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到底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其冲销程度是多大?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我国国内货币供给是否真的如央行所说,是央行根据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自主确定的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们利用两种方法对央行货币冲销的效果和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进行了研究。

首先,我们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撰写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1-2011)分析了中国央行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尤其考察了货币冲销程度。结果表明,虽然不同年份央行进行货币冲销的手段、方法和效果存在着差异,但货币冲销操作总体有效。特别是近年来,央行对国际资本流动几乎进行了完全的冲销,甚至存在着过度冲销的嫌疑。因此,国际资本流动不可能对我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和物价水平构成太大的影响。

其次,利用中国2000年1月到2010年12月之间的相关数据,我们检验了中国人民银行冲销操作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冲销效应和国际资本流动对央行净国内资产的抵消效应及其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广义货币和通胀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虽然国际资本流动能够抵消央行净国内资产变动的74.3%,但央行却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了102.2%的冲销。这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入可能仅仅改变了基础货币的供给结构,而没有影响其供给总量,因而国际资本流入的货币扩张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都应该极小。进一步的检验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检验,央行净国外资产增加一个单位只能使央行的基础货币增加0.018个单位,却会使货币乘数下降4.095个单位,结果导致净国外资产增加一个单位只能使我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增加0.098个单位。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令人惊讶的是,央行净国外资产增加一个单位不仅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反而会使我国的通胀率下降1.098个单位。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国际资本的大幅流入并不是我国国内货币供给快速增长和通货膨胀上升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国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应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我国国内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应该是我国央行根据国内经济增长情况和社会对资金的需求状况自主调节的结果。

13.中美股市与汇市的关系

陈云(华南师范大学)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股市之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内生结构突变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股市与汇市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一定的联动性,一个市场的价格运动会扩散到另一个市场,这就是股市与汇市之间的信息溢出效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

家之间股市与汇市的信息溢出一直都是经济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股市与汇市的信息溢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

就中国而言，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奇迹，但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人民币汇率长期盯住美元，股市较长时间内封闭发展。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改革大步推进，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与此同时，股市的管制不断放松，并逐步对外开放。在新的背景下，中外股市与汇市之间的关系如何？由于美国位居全球经济霸主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元汇率和美国股市波动一般会对周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那么，中美股市与汇市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股市之间是否存在信息溢出？此外，国际金融危机是否会对中美股市与汇市的关系产生影响？

通过对2005年7月22日-2012年7月30日人民币/美元汇率和中美两国股市之间的信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股市均对中国股市产生信息溢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引起中国股市的上涨，美国股市的上涨（下跌）能引起中国股市的上涨（下跌）。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一信息溢出效应发生了结构变化，在此之后，人民币汇率、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信息溢出不再显著。而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股市之间存在信息溢出，中美两国股市均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信息溢出，但人民币汇率仅对中国股市产生信息溢出。

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外股市与汇市之间的长期联动关系和短期价格引导关系。研究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由于国内股市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也会受到来自国外股市的冲击，因此，相关政策当局应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以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保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发展；而微观主体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也应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此外，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股市的影响较小，也反映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制度改革，不断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促进国内股市的发展。

14. 结识新朋友，勿忘老朋友——贸易联系持续期与贸易多元化战略

冯伟 邵军 徐康宁（东南大学）

《贸易多元化战略下的贸易联系持续期分析——以我国纺织品出口为例》，
《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结识新朋友，勿忘老朋友”，这句耳熟能详的歌词曾经唱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红极一时。其主要意思在于告诫人们在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不能忘记老朋友，不能因为有了新朋友就忽略了老朋友。这也是我们为人处事需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同样，在国际贸易领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应遵循相似的规则，即一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不仅要开拓新客户，还要维系好老客户，而且通常情况来看，维系好老客户要比开拓新客户更为重要。这就涉及

到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多元化战略和贸易联系持续期的问题。

贸易多元化战略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鼓励出口,分担贸易风险,增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而采取的对外开放战略。该项战略实施三十多年来,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现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伙伴已达二百多个国家,几乎遍布全球,出口产品数量也将近达到5000多种,仅次于美国,总出口额获得了迅猛增长。可以说,出口多元化战略仍然是拉动我国贸易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出口的有效增长不仅需要创造新的产品和进入新的市场,而且也需要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也即,贸易总额的增长不仅应来自于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或增加产品数量而获得的,即出口的数量效应,而且还应取决于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产品进行贸易时间的长短,即出口的联系效应。这两种效应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的大背景下,通过新增国家数量或出口品种数量来保障出口多元化的带动效应,往往很难实现其政策的原本目的;而维持现有国家间的出口贸易联系,通过进一步深化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或许能为出口多元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提供新的突破口,而这也正符合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窘境的特征。

所谓贸易联系持续期,是指贸易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所持续的时间,其更多的是在时间跨度上来考虑贸易双方之间交易关系的维持力。经验告诉我们,在不断地开拓新的市场和新的贸易伙伴时,不能疏忽与既有贸易伙伴之间的联系,而且一般来说,与既有贸易伙伴进行贸易拓展和深化要比重新开拓新的贸易伙伴容易得多,毕竟有前期贸易联系的铺垫,双方之间的不对称信息或是合作风险会大为减少,相应的交易费用也会减少,从而更加容易产生合作。因此,从贸易联系持续期的视角来剖析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贸易多元化战略的认识,而且还能进一步丰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内容,从新的层面为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高效率高质量的实施建言献策。

通过对我国多元化贸易战略下典型行业——纺织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国纺织品的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普遍偏短,平均生存期只有2~3年,10年存活率仅有30%~40%左右,这也凸显出以贸易联系持续期为视角研究多元化贸易战略的必要性;同时,对影响纺织品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因素的研究方面,我们还发现进口国市场规模和人均消费能力、我国所出口纺织品的初始贸易额及其产品差异化率、单位产品价值、双边贸易额、贸易距离,还有前期贸易联系、进口国地理区位及是否与进口国建立自贸区等均会影响我国纺织品贸易联系持续期的延展。这些结论对于我国如何进一步地推进贸易多元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正所谓“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重视并珍惜与现有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不仅能稳定我国贸易发展,减少外部不经济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冲击,提升我国多元化贸易发展战略的实施质量,而且还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友谊,以贸易为桥梁,拓展合作范围,深化合作领域,构筑两国稳固的经济往来。

15. 矿产资源地税收偏离与贫困

宋文飞 李国平 (西安交通大学)、韩先锋 (西北大学)、孙永平 (湖北经济学院)

《“双重扭曲”下的税收偏离与矿产资源地贫困》，《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现实中，矿产资源地尤其是西北某些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经济发展却十分落后。如榆林市，全市12个县区中有10个国定贫困县、2个省定贫困县、全市1377多个行政村尚未脱贫，占全市行政村的30%，贫困人口约50.2万。一个现实问题是：既然矿产资源地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本应该将其转为当地财富，但为何却摆脱不了贫困的现状？我们注意到矿产资源地的税收偏离问题。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的不合理会制约财政收入增长，从而不利于当地改善贫困现状。而税源偏离使得当地税收收入减少，进而对资源地经济、生态环境发展产生不良约束。

实践中，矿产资源地税收偏离现象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生产地和注册地不一致，就会使得生产发生地无法征收营业税，产生税源与税收收入背离的问题。二是跨区经营造成的税收与税源背离。由于中央政府制定的地方优惠政策有一定年限，许多企业在优惠政策到期时会迁往别的城市，以继续享受新的优惠政策，加之部分地区为了招徕外地企业搬迁，除了税收的优惠外，还大打“土地牌”，土地出让价格早已突破了国家规定的最低底线甚至出现了零地价现象，促使总部企业“候鸟式”迁徙，造成税收与税源的背离。三是总分机构所在地不同造成的税收与税源背离。随着企业改制和集团化经营的发展，大集团公司不同程度地在外地设立子公司，由于实行总公司合并统一纳税，分公司、子公司所在地的税收转移到总公司所在地缴纳，加之总公司与分公司、子公司在收入、成本、费用等项目的归属划分不尽合理，造成各分公司、子公司所在地的税收与税源背离。

产生税收偏离的根源是产权界定不清晰。我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那么代表国家获得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的主要是中央企业。以榆林市为例，中央企业在榆林占有绝大多数资源的开采权，留给地方的只有很小部分。按照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中央企业开采了大部分资源，把税收转移到了外地，对地方财政的单位贡献率较小，相对而言地方企业开采资源对地方财政贡献较大，影响地方政府引进大型企业的积极性。财税体制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公和地区收入不公平，榆林本地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进行资源的深度开发、加工和利用。

产生税收偏离的深层结构问题是关系矿产资源地切身利益的特殊税费比例过低，而增值税、所得税等一般税收比例过高。在税制结构中缺乏环境外部成本的环境税制设定，且矿产资源开采的使用者成本没有完全反映到税收中。由于使用者成本和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没有很好地解决，造成特殊税费过低，而一般税费过高的畸形税制结构。一般税费占比过大，而一般税费中的增值税、消费税等属于国税，意味着留给资源地的实际税收收入很少。在关系矿产资源地切身利益的特殊税费税制不完整、结构没有优化的情况下，资源地就产生了隐含的税收偏离现象。

产生税收偏离的另一深层原因是政府体质因素。首先,在税收的层级配置中,主要倾斜于中央与省,而地方所得比例过低。榆林市境内非再生能源资源企业上缴的增值税,中、省、市、县分配比例为75%、7.5%、7.5%、10%;企业所得税,中、省、市、县分配比例为60%、20%、10%、10%。其次,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其受国家规制的必然性。国家管制本质上是一种扭曲行为,使得资源实际价值与价格偏离,对于矿产资源地来讲,矿产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并不能完全反映到价格上,产生扭曲。从税种计征方式来看,增值税、所得税等一般税种税基都直接与价格相关,价格的变动影响税收的幅度。国家管制影响到了矿产从生产到销售的税制,这也必然对税收偏离产生深层影响。

从长远来看,应实现四个改革来解决税收偏离问题。一是实现税制结构绿色化改革。二是实现绿色财政体制改革。三是推行矿产资源价格体制改革。四是推行矿产资源领域产权改革。

理论前沿动态

16.应审慎地考虑新的人口政策

王向 聂鹏(南开大学)

《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述评》,《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就像土地一样,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从来就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独生子女一辈已经长大,四二一家庭日益普遍,养老问题凸显,年轻人身上的担子加重了。就全国而言,尽管中国从经济总量来看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但是老百姓的平均收入还处在世界中等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却过早地老化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0%,也就是说,相比于人均收入水平,中国人口老化的程度更接近发达国家。

对于中国这种现象,人们称之为“未富先老”。学者们热议“未富先老”问题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主要是养老金缺口问题),敬老爱老的社会认识,以及全社会的警惕性都还不够;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是否因为人口结构问题而失去活力。可以说,后者更为重要,这也是社会各界重提人口政策改革的背景。

从经济长期可持续的角度,说起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者一般会提高两个概念: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二者都是人口结构变化中的重要经济现象。

人口红利简单而言就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结构中年轻劳动力人口比较多,同时年轻人都注重积累积蓄,从而在劳动力资源优势 and 资本积累两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由于中国存在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但是,关于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统计不够完

善,从而导致基于不同估算的学者产生了分歧,有人单纯估计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 10%~25%之间)和对储蓄增长的影响。反对者主要是从中国的制度和结构问题出发,说中国劳动市场分割、产业结构失衡、人力资本较低等阻碍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作用,如果这些方面改善,其实,人口红利还是可以继续挖掘的。当然,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不管是这种人口红利持续时间还有多长,学者们都支持,需要通过制度或者政策调整,延续这种人口红利。

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是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两个侧面,但是因为理论基础不同,人们对它的分析视角也就不同。刘易斯转折点是基于二元经济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来),所谓的二元经济说的是,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部门(主要指农业)和现代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中就业,然而长时间内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工资是不变的,直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差不多了,他们的工资才会上涨,这个上涨的临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由于理论的复杂性和理解的多样性,人们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并不统一。以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的蔡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基于抽样调查数据、企业微观数据,从剩余劳动力人数、不同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等角度指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非常有限,可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 6000 万左右。对于这个数据,其他学者认为远远低估了,可利用的是劳动力资源不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还需要加上城镇待业人口,以及考虑中国人口的未来增长,从而提出剩余劳动力在 1~2 亿之间。另外,中国农民工是像候鸟一样流动,大量中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随季节变迁,受经济环境和劳动市场分割的影响,可能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民工荒”并存的现象,所以,中国还没有进入工资普遍上涨的时期。

对于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这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是武断的,进而得出中国需要进行人口政策大的调整也是不科学的。从人口结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上看,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注重统一劳动力市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提升劳动者素质,实现产业与劳动力资源匹配,更加重要。

17.经济系统研究新方法:基于 Agent 的计算经济学

范如国 叶菁 杜靖文(武汉大学)

《基于 Agent 的计算经济学发展前沿: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13 年第 2 期

20 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演化理论、博弈论、动态理论等数学工具的引入,经济学研究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局限和所面临的困惑,经济学研究中引进新的研究范式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现有经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观察、分析、比较和检验,考察的主体是同质的,且具有

完全理性。然而,现实的经济是由大量异质性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个体带有各自的性与主动性,每个个体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会产生交互行为。研究这种复杂系统的有效途径是计算机模拟,而不是传统的数理分析和计量检验,这就促使了仿真研究的应运而生,计算机仿真方法开始弥补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不足,基于 Agent 的计算经济学(Agent 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CE)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ACE 模型是从经济系统的基本构造元素——微观个体出发,通过仿真技术“自下而上”地生成一个允许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交流的人工经济系统。模型中的微观个体具有像现实个体一般的有限理性、学习能力和归纳能力,通过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产生宏观“涌现”现象。因此,利用 ACE 模型可以很好的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中有价值的细节信息,还原真实经济过程,揭示现实的经济规律。ACE 模型能够让经济学家在一定条件下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可重复实验的方式来研究经济问题。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ACE 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连《自然》杂志在 2009 年也刊载了一篇关于 ACE 是否将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文章。如今,国内外许多研究都将 ACE 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在众多应用 ACE 的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研究方向当属对现实市场进行模拟或检验,这些研究通过将已有的数据、特别调查的数据或实验室实验与 ACE 模型相结合来对诸如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自身的形成进行模拟,或对市场上的某种现象进行分析。除此之外,一些政府机构与实验室也开始利用 ACE 模型来为政策制订提供依据和微观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开发的微观分析模型,它在模拟美国宏观经济与过度经济、分析国际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电力系统的行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ACE 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研究工具的革新,而且带来了经济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近年来,利用 ACE 模型对组成经济系统个体的研究与过去相比更加深入、全面,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个体的优化能力以及预测能力都是有限的,并把这类假定运用到具体的股票市场、学习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之中。同时,这类关于个体学习能力的研究在经济博弈论中也开始显现出优势。自 2001 年经济学期刊《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人工智能专刊以来,十年内该期刊有 40 多篇文章利用个体学习能力、异质性等特点来研究经济行为中的博弈论问题,这已成为经济博弈研究新的微观视角和研究热点。此外,ACE 方法还极大地扩展了复杂网络方面的研究,它通过依托复杂网络拓扑结构,来研究异质性个体之间的互相影响、连接关系和博弈行为的复杂性及宏观“涌现”特征,如货币的涌现、新技术的推广。

在我国,关于 ACE 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 ACE 方法还不够重视,相关成果也不多,积极学习 ACE 这一新方法,对了解国际发展前沿非常重要;同时,在模型参数和算法选择上要注意结合我国经济系统的特点进行仿真研究,而不是照搬国外的模型。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跨学科交流的开展,相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会学习、利用 ACE 来进行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

18. 开放经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述评

李力（湖北大学）、杨柳（华中师范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主要用于描述短期通货膨胀率的动态机制，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分析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开放经济下的发展日益得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专家的重视。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开放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无论是家庭的劳动力供给、产品消费，还是厂商的投入品购买、产品定价，在开放经济下都面临着诸如货币种类选择及汇率变动、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选择等更为复杂的环境。这意味着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有必要对其模型进行修正，以体现变化了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世界经济对本国经济影响的复杂程度已远不能通过改变国内某个变量的度量方法或某类变量的传导机制加以解释。国外冲击在一国通货膨胀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直接，这使得描述通货膨胀和产出等重要宏观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开放条件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近十几年来，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简称NOEM)对将开放经济因素引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有研究对NOEM框架下建模方法上较有代表性的拓展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厂商定价与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二是中间投入品的作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第一个方面的突出发展体现为企业因市定价策略(即根据目标市场需求弹性来调整在不同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和交错定价行为(即由于调价成本和合同的存在，厂商通常采用交错方式而不是同步方式来调整价格)的引入；在第二个方面的发展则表现为考虑进口中间品对厂商真实生产成本进而对整体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

近20年来全球通货膨胀的明显下降和波幅趋缓使学者们开始尝试从全球化视角探讨一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明确考虑国际竞争压力、贸易条件、全球产出缺口等全球化因素对国内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影响。综合看来，经济学家们认为全球化导致贸易规模扩大并加剧了产品市场竞争，来自低成本经济体的进口制造品会对国内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而贸易条件恶化会通过商品市场开放程度增加本国CPI通货膨胀率。目前探讨全球产出缺口在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文献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全球化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渠道除传统的进口价格波动(包括最终制成品与原材料)及竞争调整过程外，全球产出缺口也会透过全球市场一体化而影响国内原材料价格，进而对国内物价产生影响。此外，随着劳务外包、网络及电子商务的发展，跨地域的劳务迁徙和资本流动已使得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大部分产业受到全球产出缺口影响。第二，对全球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关系，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结果说明，开放经济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显示出一定解释能力，且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国际冲击对我国物价影响日益明显。但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对开放经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大多研究停留在对国外模型套用进

行实证上。同时,虽然部分研究提出了新的观点或模型,但模型未能与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进行充分的结合,影响了模型的说服力。

随着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充裕:一方面使得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另一方面量化宽松湖北政策导致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高位波动提高了全球整体物价水平。在后危机时代,对全球化和货币政策对汇率影响间的联系的探究以及对通货膨胀、产出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对于更深入地理解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和预测其未来走势以及制订最优货币政策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